

世界佛教美术 图说大典

ENCYCLOPEDIA of BUDDHIST ARTS



总监修 星云大师
Supervis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主编 罗世平 如常
Chief Editors Luo Shiping Ru Chang

人物

PEOPL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世界佛教美术

ENCYCLOPEDIA OF BUDDHIST ARTS

图说大典

总监修 星云大师

Supervis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主编 罗世平 如常

Chief Editors Luo Shiping Ru Chang



人物

People

CSB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 / 罗世平, 如常主编.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56-7687-0

I. ①世… II. ①罗… ②如… III. ①佛教—宗教艺术—世界—图集 IV. ①J1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4790 号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

SHIJIE FOJIAO MEISHU TUSHUO DADIAN

人物

RENWU

出版人	龚曙光 李小山
总监修	星云大师
策划	佛光山宗委会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主编	罗世平 如常
执行主编	熊英
编辑委员会	心定 心保 心培 如常 妙士 妙凡 依空 觉居 觉培 慈容 慈惠 满光 慧让 慧传 慧知 罗世平 李小山 黄啸 熊英 邵军 陈粟裕 崔勇 杜作波 罗彪 徐盾 戴宇 易晴 罗简
责任编辑	罗彪 唐杰 谢爱友 严威 唐竞恩 姚帆
整体设计	戴宇
版式制作	格局视觉
责任校对	彭慧 侯婧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622 号)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965mm × 635mm 1/8
印张	1262.5 (全 22 册)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56-7687-0
定价	12800.00 元 (全 22 册)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84787105
网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55-83366138

特别说明: 因本书所涉及的图片版权人较多, 我们已尽最大努力, 以
确保获得本书绝大部分图片的版权许可, 但因种种原因, 仍有个别图
片无法联系到权利人, 烦请权利人知悉后与出版社联系, 我们将支付
稿酬。感谢所有为本书图片提供出版授权及相关协助的机构和个人。

出版缘起 与序言

◎ 星云大师



在世界性的宗教中，佛教的文物最为丰富。尤其是其中生成的佛教艺术，以人为本，在审美、教化与信仰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兼具艺术、宗教和教育等多重功能。

记得 18 岁时，还在焦山佛学院读书的青涩年少的我，提议在镇江举办一个“佛教古物展”。此举对当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犹如石破天惊，没想到竟蒙雪烦院长允准，让我们在没有任何举办活动之经验的情况下，如火如荼地规划、发动、联络、布置，吸引数十万人前来参观。展出的佛教文物有金山寺苏东坡的玉带、明朝书法大家文徵明的字画、伏波将军的战鼓，以及很多寺院的秦砖、汉瓦、龙袍、龙蛋等。

后来，我在各地弘法时就留心佛教文物的搜集。我经常省下饭钱作为购买费用；我忍受手酸腿麻之苦，不远千里捧回石雕佛像。为此，我曾遭受同道讥讽，他们认为我在“跑单帮”经营生意，对此我都不加辩解。现在，佛光山佛教文物陈列馆许多的石雕佛像，就是我

当初在各地购买搬运回来的。

佛光山开山之初，为了让大家从认识佛教的文物、法典进而了解佛教的具体内涵，欣赏佛教艺术之美，就在现在的佛光山丛林学院里设立了一处可以简单陈列佛教文物的橱柜。1983 年，佛光山佛教文物陈列馆启用，成为台湾第一所专门典藏佛教文物的博物馆。

后来，佛光山分别在台北、宜兰、台中、彰化、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开办美术馆；1988 年在美国西来寺设立佛教宝藏馆；1991 年，为法国巴黎古堡广罗佛教法物；1996—2012 年，又分别在澳大利亚悉尼南天寺、墨尔本讲堂，马来西亚东禅寺，新西兰南岛、北岛佛光山，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法国巴黎法华禅寺，以及国内苏州嘉应会馆、扬州鉴真图书馆、宜兴大觉寺、香港佛光道场等地，相继成立了 23 所佛光缘美术馆。

其中，担任总馆长的如常法师对此贡献尤多。虽然年年因为庞大的维护开支而入不敷出，但从大众赞许的声音和眼神中，我肯定了多年来的信念。这不仅具有

弘法度众之功，也兼有保存佛教文物、研究佛教美术之效，这也是我一再努力，希望达到的“佛教与艺文结合”的目标。

我经常云游世界各地去弘法，在英、法、日、德、俄等国家的博物馆，见到佛教的犍陀罗艺术、中亚的佛像、中国的佛教文物等得到良好的收藏保存；这些博物馆也经常举办各种佛教艺术展览，或是进行相关常设展出。看到这么多收藏的佛教美术精品呈现在世人眼前，我心中颇感欢喜。

我也参访过甘肃敦煌、重庆大足宝顶山及北山、山西云冈、河南龙门、江苏栖霞山等地石窟，以及印度八大圣地、阿旃陀石窟和东南亚佛教圣地，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缅甸仰光大金塔、泰国大城遗址、柬埔寨吴哥窟等地，都留有我的足迹。瞻礼这许多建筑、石刻、壁画……，从参观者专注凝视的眼眸、流连忘返的脚步、不舍离去的徘徊当中，我知道，佛法的生命已注入每一个人的心中，佛教艺术确实是世人共有的珍宝。

面对这么多瑰丽庄严的文化遗产，我感到它们不仅具有宗教性、艺术性，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文化性与教育性。然而，佛教艺术内容庞大繁复、题材多元，如何才能让大众一窥这艺术宝殿的堂奥呢？

想起自1949年起，我撰写《无声息的歌唱》，以拟人化的方式为佛门的法器发言，配上图片，让读者认识它的形状与功能。1959年，我将佛陀一生的行谊，以连环图的方式，辅以幻灯片作为弘法教材，当时听闻的信众表示，对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有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听闻者、见闻者，都认同这种配上图片讲说的方式

更容易让人接受与了解。

于是，50多年来，我便一直留意这样的佛教艺术出版，并搜集了不少这类图书。1995年开始，如常法师帮助我编印了一套适合佛教徒的《佛光教科书》，此书突破传统佛教书籍的编辑方式，一页至少配上一张图片，以便读者在阅读时获得更直观的认识。出版后，果真引起了热烈的回应与反响。

至此，我心中浮现“何不编辑一套佛教美术图说大典”的想法，这样，就可以将浩如烟海的佛教美术资料分类整理，进行图文介绍，加上现代影像，作为资讯传达的工具，必定可以裨益大众欣赏与查阅，更能在社会教化、佛教美术研究、文化传承与传播上发挥效能。

2002年，就读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的弟子如常法师，对佛教艺术尤具卓识远见，在获悉我的想法和理念后，他发心搜集海内外佛教美术资料，请教相关领域的学者，并且联系佛光山海内外道场与佛光会员协助拍摄、提供图片等，甚至发动佛光山的义工，开始投入浩繁资料的整理之中。

我闻言后，颇感欣慰，于是将50多年来搜集的相关佛教美术书籍一一捐出，让如常法师成立编辑部，着手进行相关工作，并将出版《浩瀚星云》一书所得的版税新台币1000万元（合人民币200多万元），作为这套书的编撰启动费用。这便是《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出版的缘起了。

在编辑这套图典的过程中，佛光山陆续在全世界成立了20多所佛光缘美术馆。一个宗教团体成立美术馆，它的宗旨、经营理念、管理心态，与社会上的博物

馆或美术馆是有所不同的。佛光山自开山伊始，就主张“以文化弘扬佛法”，40多年来，不断致力于佛法人间化、生活化、艺文化，借由艺术、文化带动佛法的弘传，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佛光缘美术馆”就是依据这样的精神目标而设立的。它除了重视典藏资料的保存和管理之外，更积极编辑典藏图录对大众展示公开。

这也得益于我弘法的数十年当中，经常有信徒、收藏家、文艺界人士美意相赠知名人士的书画，或是曾经与佛光山有缘的艺术家将作品捐予佛光山典藏，如：旅美画家李自健，美学家高尔泰，画家史国良、何山、贺大田、田雨霖、丰一吟、李奇茂、施金辉和阿虫先生，等等。更蒙震旦文教基金会陈永泰、陈白玉叶贤伉俪捐赠给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一批佛教文物，这些文物除滋养十方参观者外，也有部分收录在此套书中。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罗世平先生来台讲学，我得知罗教授曾经主持和参与国内外多项学术合作项目，因为他的学识涵养以及对佛教美术史的研究，透过如常法师的因缘，我便邀约他一同参与图典的编撰工作。罗教授深感这套书在学术界、艺术界与宗教界的重要性与历史意义，欣然接受这项巨大的任务。他回到北京后，便将全国最优秀的教授及研究生一一组织起来，协助佛光山图典编辑部撰文与审稿，不分晨昏，无时不在内容纵横古今、驰骋中外的稿件之中忙碌，使得《大典》的编辑日渐成熟。

2013年，湖南美术出版社总编辑黄啸、副社长熊英一行到访佛光山，偶然了解到《大典》的编撰情况，

表达了希望《大典》能由他们在大陆出版的心愿，我觉得这是一种佛缘，也是一件有利于佛教文化传播的好事。湖南美术出版社于2014年初正式启动《大典》项目工作，成立了管理、编辑、拍摄、设计、校对工作团队，参与人员有20多人。他们对图片进行拍摄与购买，其间走访了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印度、俄罗斯等国家，以及国内20多个省份，对近年新发现的佛教美术文物进行增补收录；针对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文字的习惯用法、历史纪年、出版规范等对书稿做了编辑加工；在装帧设计上做了很多努力，使图书有了一个很好的视觉呈现效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大典》在祖国大陆的成功出版。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共有9000余个条目，近800万言，15,000余张图片，采取图随文走的方式，配上精简的文字说明，包括佛教建筑4册、石窟5册、雕塑4册、绘画4册、工艺2册、书法·篆刻与人物各1册，加上总索引共22册。

内容以释迦牟尼佛为主轴，搜集佛教美术存世作品，举凡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篆刻、人物、工艺等7大类别的佛教艺术作品，都在编纂之列，区域广达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各大洲的多个国家，重要博物馆包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亚洲艺术馆、印度国家博物馆、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等。光是各国语言文字的翻译、考证及图片的收集，就极为艰辛不易。

此套丛书的十二大特色为：

1. 佛教美术首次结集
2. 越古及今五洲荟萃
3. 装帧精美二十二册
4. 保真彩印八开版本
5. 精选条目九千多则
6. 图鉴说文八百万言
7. 高清彩图万五千幅
8. 分类专论图文导读
9. 附列图表辅助说明
10. 专有名词附录解答
11. 笔画音节检索便捷
12. 最新成果整体呈现

本《大典》为方便读者查阅，另备多种检索方式，如：“总索引”“词条汉语拼音音节索引”“图片索引”。在总索引册中设有年表，作为各册内容的相关补充资料。

50多年来，诸多的好因好缘，加上现代化弘法的需要，促成了这套书的产生。该书的参编人员主要有：心定、心培、慧济、慈惠、慈容、依空、慧传、永明、永进、满果、满义、满光、觉培、如常、慧知、慧让、觉居、妙士、妙凡、罗世平、陈庆英、金申、林保尧、黄文昆、贾应逸、王镛、王海涛、崔勇、李裕群、邵军、张总、谢继胜、成耆仁、韩东洙、刘涛、李福顺、林文彦、游国庆、陈清香、严智宏、张宏实、潘亮文、潘禧、陈奕恺、陈俊光、苏铉淑、李小山、黄啸、熊英、杜作波、罗彪、徐盾、戴宇、陈粟裕、罗简等。

编委中，还有主编罗世平教授带领的王云、李翎

博士和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博士生王中旭等26人。本山弟子则由如常法师领导，有永智、觉了、妙年、妙绎、妙果、如玄、如展与英文编辑慧开、慧峰、满和、妙西、妙光、有恒、妙地、有纪、有律，以及丛林学院毕业的 王美智、潘绮媚、周媛及王玉梅等人参与，他们除了撰稿之外，更负起编务的重责大任。

另外，佛光山信徒赵翠慧、胡丽慧、周莉加与默默付出的义工及广大护持的信徒，也为此套书的编撰耗费了心血，加上海内外佛光道场僧信二众的支持等，可以说，这是佛光山再一次僧信二众集体“创作”的成就。

对于本套书的出版，我最大的期盼是能为佛教、为文化艺术留下基础资料，倘若面世后，能引起建筑界、教育界、雕刻界、书画界、工艺界、文化界的重视，引导读者进一步阅读相关的佛教艺术书籍，学习更多，了解更多，喜爱更多，乃至从一张张珍贵的图片中获得内心的法喜与充实，进而爱护佛教艺术文物，那么，这套书的出版就已实现最大的意义和愿望了。

未来，本套书还将出版英文版及光碟版，以利佛教广弘海内外并方便大众使用。祈愿透过佛教艺术的光芒，让世人看见佛教文化的内涵，获得佛法的欢喜和利益。

是为序。

星云

2016年11月于佛光山开山寮

凡例

① 本图典为便于读者了解世界佛教美术之全貌，按美术学科分类编排，依次为建筑4册、石窟5册、雕塑4册、绘画4册、书法·篆刻1册、工艺2册、人物1册、总索引1册，共22册。

② 人物卷为1册，为《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人物》。

③ 人物编选标准：原则上收入1940年之前出生，在佛教美术上造诣深厚、成就卓著的建筑师、画家、雕塑家、书法家、篆刻家、工艺美术师、高僧、居士等代表性人物；部分对佛教美术有重大影响和贡献者（不受上述出生年份限制）也酌予收入。

④ 人物卷现收录佛教美术人物词条924则，图片782张。

⑤ 本图典的词条按汉字笔画排序。首字笔画少者在前，多者在后。首字笔画数相等的，按起笔笔形依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乚）的次序排列。首字相同的，以第二字的笔画按上述规则排序，以此类推。

⑥ 词条名以人物本名为主，字号为辅；僧人法名前加“释”字，约定俗成的名称则不加；皇帝以帝号称名。若同一人物出现两个或多个名称，则以“见……”的方式呈现。

⑦ 若图边文中的作者名前有“（传）”字，表示此图作品传为其所作。

⑧ 书中的中外古代国别、地名，一般直接括注现今名称。

⑨ 书中不常见的外国建筑名、人名、地名、机构名、历史时期、艺术样式等专有名词，一般括注英语。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建筑名、人名、机构名等注明拉丁字母对音。一般名词术语不注明外语。

⑩ 凡人物作品存放地在中国的，作品图边文中的地点之前省略国别，如“陕西西安”；作品存放地不在中国的，作品图边文中的地点标明国别，如“日本神奈川镰仓”；对于存在主权争议的地区，暂不标明国别。

⑪ 人物作品图片不论是局部图还是整体图，其图边文中的尺寸信息，除册页和联语（标注单幅尺寸）外，均是指该作品的整体尺寸，若尺寸不详，则不予标明。

⑫ 各国的历史年代依据各国通用的历史年表，文中出现的王朝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⑬ 为方便检索，卷后附有“词条汉语拼音音节索引”“图片索引”。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

人物

总论



今马图拉)、鹿野苑的佛、菩萨像,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大佛,中国云冈、龙门、敦煌石窟及大足、安岳石刻,以及各地的寺院塔幢,还有出土的造像、传世画作等,其创作的年代跨度与分布的地域范围大,因而很难构筑起艺术家与工匠、创建者与复造者们的谱系。可以说,佛教艺术体系主要是由无名工匠所创造的艺术品构成的,与近现代社会以艺术家个人创作为主的艺术体系确有不同。

现今的研讨,离不开文献累积中画圣诸贤的事迹,更应重视敦煌写经的题名、石刻刻工的辑录、出土唐卡的类型、偏远石窟中诸族工匠的留名。虽然这些材料零散不整,却比历代古书的转载更贴近历史真相。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亦难将这些成果辑全,只能尽力选择一隅,以示学术发展轨迹,勉力使古匠先哲的光芒不致全掩。

中国及蒙古佛教美术人物

(一) 汉地

1. 书法

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特殊的书法艺术。佛法主要以经典的形态传播,抄写经典就是佛法弘传流通的方式,也显示了佛教书法的特点。佛教书法体现于汉、藏、蒙、傣等文字中,有梵篋、竹简、纸本、绢本、石经、版刻、碑记、题铭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汉地毛笔书法极为突出。经典与碑铭的形成须经传译、抄写、镌刻上石等工序,其翻译与作者的情况稍

微明朗,而书写与镌刻者多未留名。敦煌与吐鲁番是中国出土佛经既丰且珍的集中地。1900年,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密室内发现大量十六国(304—439)至北宋(960—1127)时期的文书,其中写本佛经占90%以上。吐鲁番则前后出土多批佛经,直到2010年,吐峪沟石窟遗址考古中仍有佛经出土。这些写经一般被称为“经生书”,但仅有少数写经留有经生姓名。历代碑铭、刻经也有些书手刻匠存名,因中国历史悠久,经学者们多方探求,现能收集到的官私经生写手与刻匠姓名仍有不少,以下择要而述。

(1) 魏晋南北朝

《高僧传》载,西晋(265—317)时,洛阳大市寺有安慧则,手写细书黄缣《小品般若经》一部,字小如豆而分明可识,后遇事经火而不焚。中国现存最早的写经发现于新疆吐鲁番。1912年,吐峪沟石窟出土了西晋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写本(刊载于日本1915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2002—2005年又发现了写本的新残片。该写本题记指出,此经于元康二年(292)由竺法护执胡本口授,聂承远和上弟子竺法首笔受,至元康六年写成。元康四年(294)译于酒泉,由竺法首笔受的《佛说圣法印经》则有日本知恩寺具题记的传世古本。¹作为这两部译经的抄录者,竺法首应该是现知中国最早的写经者。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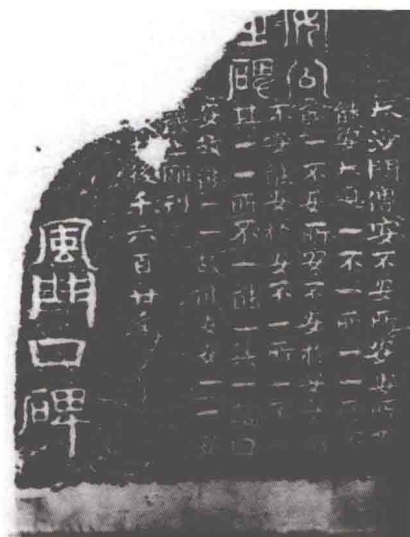
甘肃省博物馆藏《法句经》第二十八《道行品》与第三十六《泥洹品》,卷末题记分别为“(前凉)升平十二年(368)沙弥净明”(“东晋)咸安三年(373)十月二十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可知书写者是净明。上海博物馆藏后凉麟嘉五年(393)王相高写、支谦译《维摩经》残本。北凉“神玺三年”(399,应为天玺元年)《正法华经》卷第十《光世音普门品》由张施所写。³西凉

建初元年（405）比丘德祐所书《十诵比丘戒本》，体现出书体由隶到楷的自然过渡。有趣的是，后三者题记中均有“手拙”“书（疏）拙莫见笑”等词句，可见当时当地的写经风尚。吐鲁番所出己丑岁（449）《持世经》，是来自丹杨郡（治所在今江苏南京）的吴客张休祖为北凉王沮渠安周所写。东晋（317—420）“书圣”王羲之或写过《佛遗教经》⁴。东晋隐士谢敷与名相谢安族人谢静各擅隶、草，王僧虔《论书》评价他们“并善写经，亦入能境”。

南北朝（420—589）写经的官私书手由寺僧、经生与朝廷书吏组成。写于北魏永平四年（511）的《成实论》卷第十四题记中有“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所写论成讫”“典经帅（师）令狐崇哲”等内容，楷书仍具隶味。《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四题记载“信士张双周为命过妻令狐胤姬写供养”。令狐休宝为西魏（535—556）瓜州刺史元荣抄写了梁武帝的《东都发



梁武帝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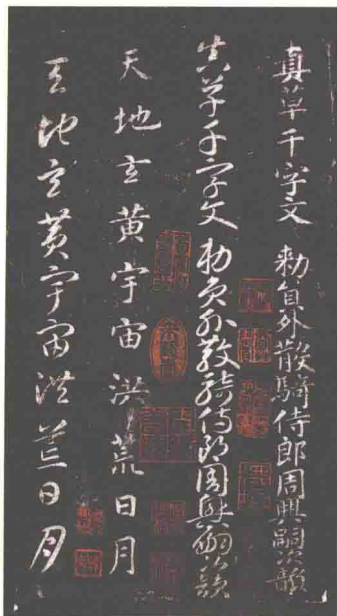
洪顶山摩崖安公之碑 安道壹

愿文》，西魏前后多有令狐家族写手。北周（557—581）有保定元年（561）佛弟子张瓮生写的《大般涅槃经》。南朝梁（502—557）有天监十八年（519）戴萌桐写的《出家人受菩萨戒法》，为楷书经本。

北齐僧人安道壹，生卒行状不明，在今山东东平的洪顶山与邹城的铁山、尖山留下了不少刻经与题名，字迹非常壮伟。邹城尖山、铁山等处刻有《文殊般若经》《大集经》节文及赞其书法的《石颂》。洪顶山的“大空王佛”四字，高9.3米，宽4.1米，题记中有北齐河清三年（564）、武平（570—576）及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号，并使用佛灭纪年，可知其活动于北朝（439—581）晚期。《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应是其弟子所刻。“龙门二十品”中造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的《始平公造像》，由朱义章书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曰“雄重莫如朱义章”。

（2）隋唐

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居吴兴（今浙江湖州）永欣寺阁楼抄经三十年，创“永字八法”，作《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虽然今存者仅有日本小川简斋氏与敦煌藏经洞蒋善进临本，但影响深远。僧智果有“得右军骨”之誉，留下了《心成颂》。隋襄州（今湖北襄阳）



真草千字文碑（局部） 释智永

祭酒从事丁道护，因开皇六年（586）写《兴国寺碑》、仁寿二年（602）书《启法寺碑》而享誉书坛。仁寿元年（601），瓜州（今甘肃敦煌）崇教寺沙弥善藏书《摄论章》卷一，全篇行文气势连贯，体现出佛经正楷章法不拘一格的特点。刻于大业五年（609）的《泛爱寺碑》可能为史家李百药所书。

唐代佛教书法辉煌一时，僧俗两界群星璀璨，杰出书家多擅写经书碑，雕版印经此时也已出现。褚遂良晚年书《雁塔圣教序》，由万文韶刻字。怀仁法师集王羲之行书成《集王羲之圣教序》，由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贞观五年（631）欧阳询书《化度寺碑》，显庆三年（658）到范写《道德寺碑》。欧阳通继承父业，写《道因法师碑》，由常长寿、范素刻成。龙朔二年（662）张延寿写《修正寺舍利塔碑》。李邕曾书《麓山寺碑》等，并化名黄仙鹤、元省己、伏灵芝刻铭。⁵武则天亲书荐福寺额，上官婉儿书千福寺额。颜真卿的作品有《多宝塔碑》（史华刻）、《八关斋会报德记》（石从建、高元瞻刻）、《天下放生池碑铭》（吴文休刻）。徐浩书丹碑经多篇，《不空和尚碑》即其所书。



圭峰禅师碑（局部） 裴休

史惟则擅隶，存世作品有《大智禅师碑》。楚国寺僧璋上人写有《一切经》。钟绍京小楷与榜书擅名当时，传世之《转轮王经》被归在其名下。⁶裴休写有《圭峰禅师碑》等。僧怀素性疏放，不拘小节，“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柳公权曾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大达法师玄秘塔碑》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后者由强演、邵建和刻成。天水强氏是著名刻工家族，强琼为玉册官，强综为中书省刻字官。

隋唐时期，包括僧官在内的很多官员都擅书，敦煌书家中不乏此类人。晚唐（846—907）都僧统唐悟真写过很多奏表牒文及僧俗人物邈真赞，如《释门文范》《唐和尚百岁书》及《金光明最胜王经》等。而敦煌释恒安，俗姓康，是少见的胡人书法家。

《妙法莲华经》与《金刚经》在这一时期特别流行，这一点从敦煌写本中即可得到证实。前者有释楚金、释义道与陈燕丁所书版本，后者有释梦英、张钦元、李宗书、盖巨源等人所书版本。《心经》有窦巩、赵偃所书版本，连官人杨氏也有作品留传。高坚书有

《梵网经》，释道秀与释法昭皆书有《观无量寿经》，陈仁钦书有《阿弥陀经》。大历六年（771）陕西富平陈初刻《身观经碑》。这一时期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者也极多，如元载、释令洪等。胡季良曾书浙江杭州龙兴寺、萧山隆兴寺、湖州天宁寺经幢。张少悌则书《尊胜咒》，奚奖书经序。王修已、李瑞符书《尊胜凡间记》。大（太）和三年（829）徐智端、毛季平、王柬、杨维晟等人都刻有经幢。长安百塔寺有大（太）和六年（832）著名诗人贾岛从弟僧无可所书经幢，同年崔涣书《尊胜幢赞》，曹欣书《尊胜幢题名》。另，内供奉杨万岁曾刻洪福寺经幢。⁷

唐代，官府经生分别任职于秘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左春坊等机构，职位有御书手、楷书、楷书手、群书手等。宫廷秘藏中有许多名作，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国诠所书《善见律》等。敦煌写本中可以看到很多具体的职位名与姓名，如秘书省楷书孙玄爽、门下省弘文馆楷书任口、门下省群书手封安昌、左春坊楷书萧敬、书手刘意等。民间经生如李奉裕，写有《阿弥陀经》；而曾写六十卷《佛本行经》的吴彩鸾，有“女仙”之称。另有王绍宗，为生活而写经，是经生中的典型。

官府镌刻匠师属中书省，称玉册官。雕版印刷实为传播佛典而发明，但留存至今的隋唐实物极为少见，如西安、成都等地发现的唐代《陀罗尼经咒》，敦煌《金刚经》等，尚有四川成都龙池坊“卞家”“过家”

等印坊的署名。

（3）五代、两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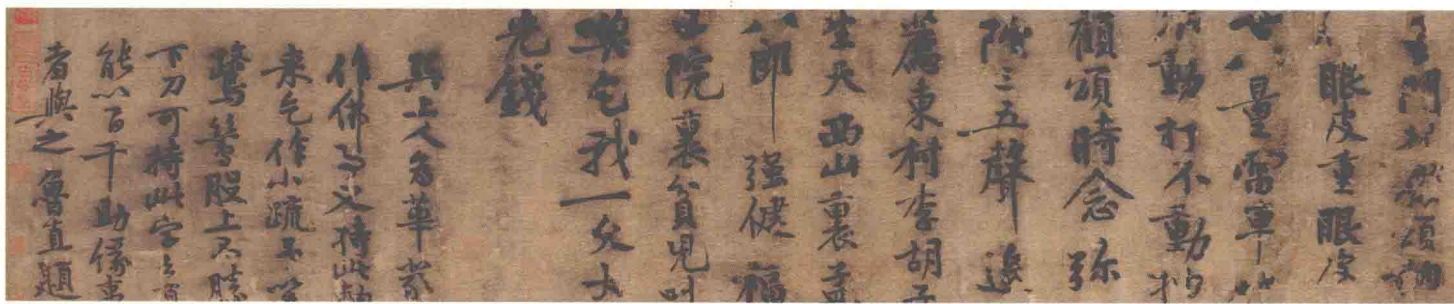
帝王中，南唐（937—975）国主李煜（961—975年在位）曾书《心经》，北宋哲宗（1085—1100年在位）亦写经，南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书有《金刚经》。苏轼所写《心经》与黄庭坚所写《诸上座帖》都是名作，他们和米芾等人与禅师多有交往，书法创作各有意境。另有叶清臣书《法华经》，钱公辅书《佛遗教经》，柳阅书《楞严经》，释道肯书《金刚经》，

释瑛公书《华严经》，南禅师书《四十二章经》，等等。此外，曾有温州参军写《金刚经》一卷，请入佛殿供养，后其买舟涉海还乡，途中虽遇风暴，却也平安抵岸。

玉册官武宗古于北宋靖康二年（1127）刻《随州大洪山崇宁保寿禅院十方第二代楷禅师塔铭》⁸。后唐（923—936）侯晏刻龙潭寺经幢，后周（951—960）汪元青



苏轼像 赵孟頫



华严疏（局部） 黄庭坚

刻《何四娘等舍利塔记》。北宋崇宁元年(1102)蔡卞所书《楞严经偈语》被刻于山东济南灵岩寺壁,政和五年(1115)潘冀、潘翠刻《乾明院建塔记》,政和八年(1118)张崇智镌《圆相观音瑞像颂》,宣和六年(1124)邵详、邵择刻江苏江阴寿圣院《泛海灵感观音记》。

这一时期,敦煌的经生书手亦留下了一些珍迹。如北宋建隆三年(962)律师僧保德题写佛曲《散花乐》《和戒文》;开宝三年(970)知术院弟子阎海真写《王梵志诗》;开宝四年(971)比丘圆安写《礼佛发愿文》;太平兴国二年(977)显德寺学仕郎杨愿受写《大目犍连变文》。

(4) 辽、金、西夏、元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河北唐山丰润天宫寺塔出土的辽代(907—1125)官私写印佛经,使《契丹藏》显露真容,并使一批雕版匠师浮出水面,如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印经中还提及“孙守节等四十七人同雕”⁹,辽代燕京名书家庞东升也参与其中。有些经版十分精美,还带有扉页插图。¹⁰

北京房山云居寺的辽、金(1115—1234)石经据《契丹藏》刻成。辽重熙十三年(1044)至大安九年(1093)这一时期的刻工有吴极、奉峤、法资、邵师仪、邵师言等,书丹留名者有王诤、高准、僧惠纯、沙门志莹等。重熙十三年,石匠作头刘继克刻辽宁朝阳北塔石经幢,马孟哥镌《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¹¹。大安二年(1086),李成、李显刻《广公戒师塔铭》。大安三年(1087),逢正等刻《登州福山县洪福寺寿公法师灵塔铭》。刻于天庆七年(1117)的《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石经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中有画师刘彦忠等人的题名。供御石匠曹辩镌《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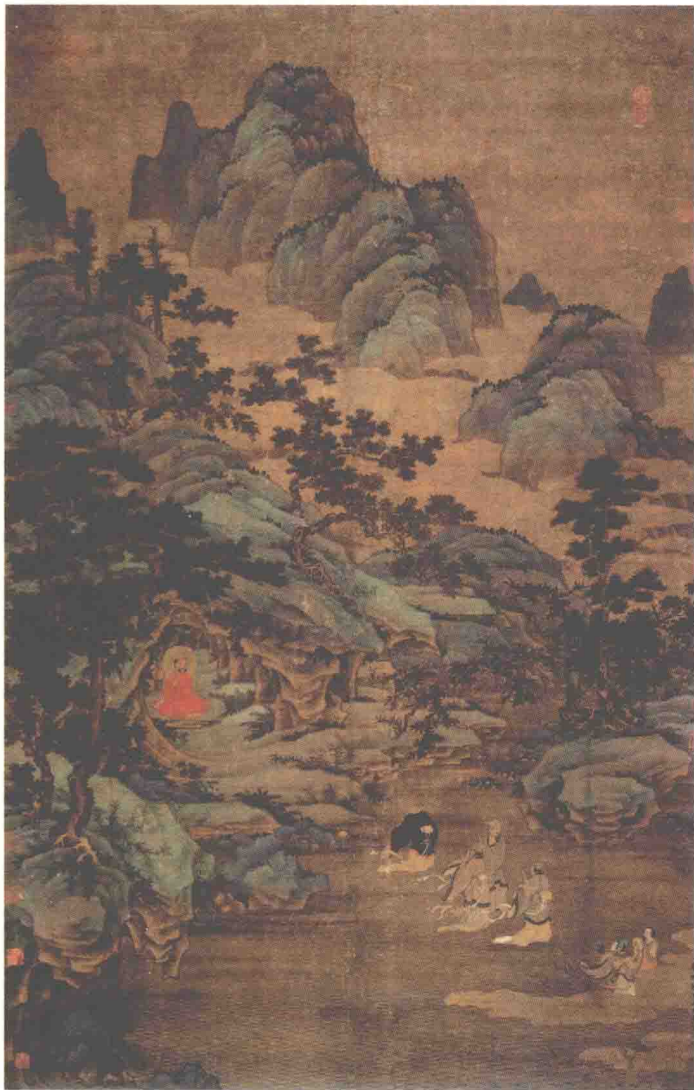
私人捐资修葺僧舍并刊印《大藏经》捐与清水院(今北京大觉寺)之事。

金大定五年(1165),僧道煦书并镌《定觉寺碑》,石匠邢立刻《华藏世界海藏碑》。大定二十三年(1183),尼德岩为父建尊胜幢,由王京、王卞镌刻。天会六年(1128),何永寿刻《十方大悲禅院碑》。皇统二年(1142),田初刻《妙空禅师塔铭》。皇统四年(1144),仲汝羲刻《沂州普照寺碑》。

西夏(1038—1227)神宗(1211—1223年在位)嵬名遵项工篆隶¹²;仁宗(1139—1193年在位)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书法;切韵博士浑嵬名遇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额正面的汉文系张政思所写;上殿宗室御史台正嵬名直本印施的《妙法莲华经》,是由“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刻印的;而《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由尚座袁宗鉴、杜俊义、朱信忠、张师道等十七人印施,其笔受者为和尚刘法雨,书手为索智圆,雕工为西天智圆,刊印者为何森秀。

元代官府设金玉局、石局,各地有分局,民间有刻字店,石刻匠师多在其中。至元三年(1266),僧福绵刻《广慧大师塔铭》。僧宗政善书能刻,至元十七年(1280)刻《印焘道行碑》《显公大禅师德行碑》。元贞元年(1295),石匠提控汤仲信刻《灿公塔铭》。大德四年(1300),尚德刻《重修滑州净行寺北弥勒院碑》。大德七年(1303),黄庭秀刻《大元国大宁路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同年申天祐刻《龙川和尚塔铭》。

赵孟頫写的《妙严寺记》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很著名,后者乃为其友中峰明本所书。明本所题画赞质朴直白,影响广达日本。赵孟頫门客茅绍升专刻其书迹。吴镇尝写草书《心经》,管道昇写有《金刚经》,



龙王礼佛图 赵孟頫

鲜于枢尝写《檀波罗蜜》，曾遇、班惟志尝写《大藏经》，陈自幼写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各人各有专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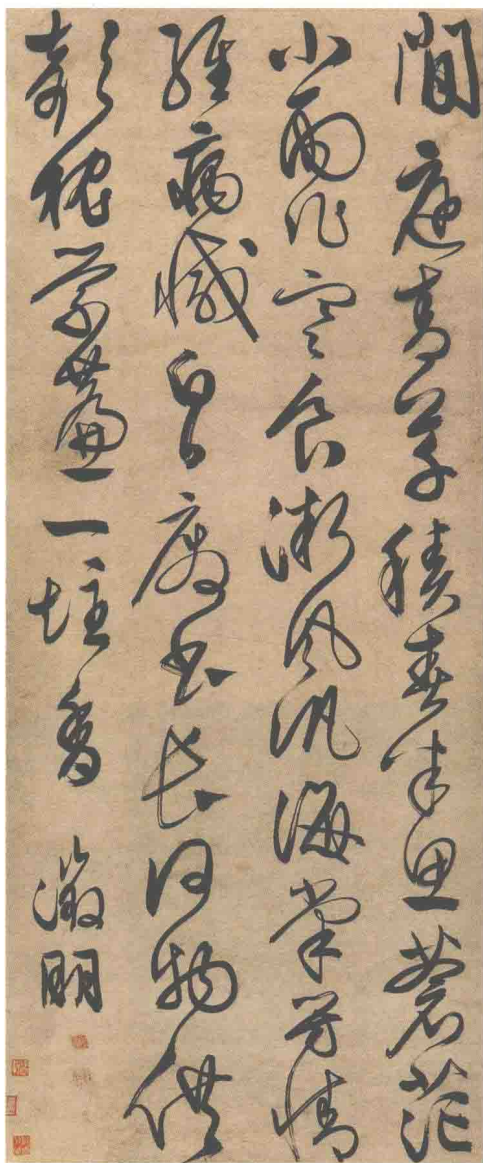
(5) 明清

曾任明代中书舍人的明勋法师，天启年间（1621—1627）忽患人面疮，痛不可忍，于是写《法华经》《金刚经》及《楞严经》，并拜《慈悲三昧水忏》，疾患遂不药而愈。¹³

书画家文徵明写有《心经》，其专用刻工章简甫曾刻《重修双塔记》。章氏家族擅刻，章简甫之子章藻刻有《佛说八大人觉经》《梵网经》和苏州虎丘白莲池《金刚经》经幢。董其昌号香光居士，其书房称“画禅室”。他以禅宗史比附画史，以南宗喻文人画，

以北宗喻匠人画。八大山人，作书、作画以中锋为用笔的基干。祝允明、黄道周也是文人书法大家，各有写经存世。安徽歙县江周刻《大圣菩萨宝塔碑》，陈元仲刻《净严和尚塔铭》，叶成与陈喜刻《灵鹫山石塔款识》。林则徐政务之余唯好书法，留下多种写经。

释全书、姜浚曾书金字经；俞允文、洪度、高燮、溥心畲写有《金刚经》；杜大绶、裘曰修写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于敏中写有《华严经》；吴拜、许宝衡、徐乃钊、欧阳渐均曾书《心经》；沈善登写有《阿弥陀经》，吴芝瑛写有《金刚经》和《楞严经》。赵之谦是清代书画大家，其书画的特色是以碑法入帖，



诗 文徵明

以隶法入画。邓石如精通真、草、隶、篆四体，擅篆刻而创派开宗。

明永乐十一年（1413），钻字匠罗泰安镌《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景泰二年（1451），秦旺刻《鱼篮观音像并赞》。天顺五年（1461）所刻《重修弥陀禅寺记》，碑阴有《西方极乐世界图》。宣德六年（1431），古杭儒士沈福镌《建白塔记》。宣德九年（1434），秦贤、潘贵镌《筇竹寺碑》。正统八年至九年（1443—1444），贾英刻《敕赐法海寺碑记》与《楞严经》经幢。天顺三年（1459），工部营缮杨春刻《永隆寺碑》。此后数年，苏福成、王敬、顾信等人刻《观音寺碑》《惠明寺碑》《禅房寺碑》。

康熙四年（1665），朱士松刻宋张即之所写《金刚经》于江苏镇江焦山。乾隆十九年（1754），焦国华刻《慧层寺塔院碑》。道光二年（1822），张永功、周行山刻《楞严圣会碑》。道光十年（1830），张翰刻董其昌所书《心经》。

（6）近现代

近代（1840—1919），弘一大师的书法别具一格，尤能体现佛教内涵。李瑞清诗、书、画皆精，虽号称清道人，却擅画佛。叶恭绰精于诗、书、画，曾影印古版佛经，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于右任的草书堪



释弘一

称入胜。赵朴初诗词、书法声名极盛，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星云大师的书法也独具魅力。邓散木擅长书法、篆刻，真、行、草、篆、隶各体皆精，在艺坛有“北齐（白石）南邓”之誉。林散之幼习书画，在中日书法界颇受尊敬，逝世前书“生天成佛”四字。中国僧俗书法家可谓不胜数。

2. 篆刻

印章在中国历史悠久，牙、铜等硬料主要用于制作官印，篆刻艺术则采用较软的材料。相传元代王冕开始用花乳石（青田石之类）刻印，可算是文人以石材治印的开端。篆刻与佛教发生关联比较晚，而且专治佛印者罕见。但印人或好佛事，或通佛学，亦有僧人好治印，因而篆刻艺术中不乏佛教内容。

明末嘉兴人丁元公笃志禅道，工诗，善书画、篆刻。清初，年已垂暮，入佛门（僧名净伊），住杭州六通院专攻佛画，潜心治印而深得秦汉之法，但传世印作很少。明代中举的万寿祺，参与抗清失败后服僧衣，癖嗜印章，辑有《沙门慧寿印谱》。曾官山东济宁府同知的黄易，广搜碑刻，对发现、识别山东石刻佛经，如邹城四山摩崖刻经等多有贡献，还绘有访碑图。奚冈篆刻风格清隽，为浙派“西泠八家”之一，书画亦为浙中巨擘。篆刻家赵之琛同为“西泠八家”之一，亦工书善画，晚年喜画佛像。清僧续行有《墨花禅印稿》五卷传世。僧达受，字六舟，先为浙江海宁白马寺僧，后住持杭州西湖净慈寺；精篆刻，好摹拓古器，被阮元呼为“金石僧”。

3. 建筑、雕塑

（1）魏晋南北朝

佛教于两汉之交传入中土。得益于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佛教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并自东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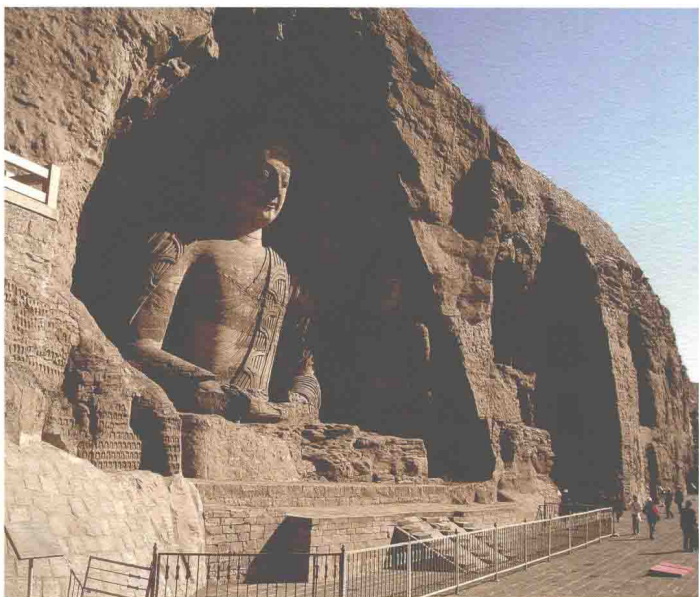
开始有大发展。汉末到西晋的佛教美术作品，并非被崇拜的佛像，而是铜摇钱树、纹饰繁复的铜镜、陶瓷谷仓罐等。东晋十六国时期，汉人有了出家的资格，加上经典的翻译与教义的传播，佛教艺术逐渐繁荣起来。

东晋的戴逵是创造中国式佛像的划时代人物。他本为工书善画、能琴擅塑的隐士，因佛像“古制朴拙”“不足动心”，所以苦心孤诣，在造丈六无量寿佛与菩萨像时，在帐后“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¹⁴，作品广受赞誉，为“百工所范”。其子戴颙继承父业，曾指导南朝宋（420—479）太子铸佛像。

南朝（420—589）崇佛帝王与名僧辈出。僧祐为目录学家，又具工巧明，曾监造光宅寺金铜大佛，又于剡县续造弥勒大石佛（今浙江新昌大佛寺弥勒佛坐像），这座佛像原本由僧护、僧淑主持修造而未完成。南京栖霞山石窟摄山大像为明仲璋、僧法度所造，亦是由僧祐“准画仪则”。梁武帝（502—549年在位）、梁元帝（552—554年在位）都热心于佛事，武帝萧衍曾与达摩对话，于全国广造佛寺，“南朝四百八十寺”正是当时佛教繁荣发展的写照。

北魏（386—534）时，洛阳城段晖宅地下出土一尊金像，趺座上刻“晋太（泰）始二年（266）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荀勖时任西晋侍中中书监。一般题铭所言造者为施主，并非艺匠，但诗、书、画、乐俱精的荀勖¹⁵，自己雕造佛像的可能性极大。

北魏石窟雕塑和铜石造像的数量丰富，具有皇家气派的云冈石窟汇聚了犍陀罗、秣菟罗及中土等多种艺术风格，可谓凉州、河北、山东等地雕塑艺术之汇总。来自凉州的昙曜任沙门统，在云冈主持开窟五座，窟内造像“令如帝身”，窟窄佛壮，雄视一世。随后冯太后与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推行汉化政策，



云冈石窟第20窟

迁都洛阳并新建龙门石窟，佛像样式转为秀骨清像，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这种造像风格始于云冈后期开凿的石窟。北魏宦官宕昌公、将作大匠王遇（钳耳庆时）祖辈世为羌族渠长，他深得孝文帝与冯太后宠爱，曾主持建造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大型建筑群，建云冈第9、10窟等双窟，并在家乡造晖福寺，寺碑由巨鹿石匠苏棠刻成，碑文述在寺内为帝后修三级宝塔之事。王遇将穹隆式建筑改造为祇园精舍式，即石刻仿木构廊柱瓦顶建筑，影响极为深远。

蒋少游为“平齐户”，由乐安（今山东博兴）迁往平城，得高允等赏识而任将作大匠等职，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冠服工艺，无所不能。他曾赴南齐观摩建康城（今江苏南京）宫殿的建筑样式，后与李冲等人共同营建洛阳城，¹⁶又为孝文帝设计汉化服装，使得褒衣博带式的装束在北魏广为流行，并出现于云冈、龙门石窟的佛像之中。太和十七年（493）迁都后，龙门石窟的古阳洞和宾阳三洞出现了形象、服饰彻底汉化的佛像。

北魏灵太后胡氏，临朝时曾主持修建洛阳永宁寺塔。该塔由强弩将军、都督郭安兴设计建造，¹⁷《魏书》